

評 論

自由身體的追尋：
評黃金麟著《戰爭、身體、現代性》

2009，台北：聯經出版社

鄭祖邦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tbcheng@mail.fgu.edu.tw)。

Tsu-Bang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o Guang University.

由黃金麟教授所著的《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 1895-2005》（以下簡稱《戰爭、身體、現代性》）一書所採取的是一種宏觀的結構性分析，但是，作者卻是從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瑣事中說明本書的緣起進而提出本書的問題。作者注意到，儘管台灣在政治與軍事上解除動員戡亂體制（1991年）已經超過十餘年的時間了，但是，在我們社會生活中仍然充斥著「社會軍事化」（societal militarization）的現象（頁203）。例如：在補教業中，寒暑假期間時常舉辦「魔鬼訓練營」，學生頭綁著「必勝」的頭帶、身著迷彩服管理學生的「營長」，最後還有退訓者桌上放著「陣亡」的小旗子（頁215）；在大學校園中，社團的幹部訓練時常仿效軍隊設置「值星官」來控制時間、指揮活動（頁I, 214）。除了教育場域之外，在勞動場域也時常可以看到軍事紀律化的管理，例如：台灣的外勞管理、大陸台商的工廠管理等等（頁216-7）。作者不禁提問：「為什麼學生會用部隊集合的方式，來組織和擺置自己的身體？」「為什麼自己高中和大學時期經歷的場景，到現在都還存在？」（頁I）

爲了回答上述身體軍事化治理在當下台灣社會滯留的現象，作者結合了超過百年的台灣與中國近代史（1895-2005年）的研究來加以回答。如果從書名的主標題《戰爭、身體、現代性》來看，在這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中，作者還隱含了一個大哉問：「如何觀察台灣的現代性？」作者選擇了「戰爭」與「身體」這兩個面向作爲切入問題的方式。不過，正如作者所言，戰爭作爲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但是，在台灣過去的社會學研究中卻極度缺乏對戰爭議題的相關研究（頁1）。當然，除了研究資料上的缺乏（國防資料不易取得、軍事資料的機密性等），筆者認爲，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對非常態性的戰爭現象進行研究也構成了一個研究上的障礙。正是在這點上，作者有別於傳統以實用爲主的行

為科學研究（如：軍民關係、軍校生適應等）（頁8），而以身體的軍事化治理作為觀察台灣戰爭與現代性發展軸線的窗口，「身體」也同時成為了作者連結理論與歷史經驗分析的關鍵元素。所以，或許我們可以說作者嘗試從身體的角度，來觀察戰爭對台灣現代性型塑出的特點。

在整體理論架構與問題意識的建立上，傅柯的權力分析可以說是作者引用與對話的重要對象。基本上，作者是藉由傅柯論點的引用來對戰爭研究做出了兩個面向的反省。首先，從傅柯「權力生產性」的命題中，作者提出了「戰爭生產性」的想法。作者認為，傳統的戰爭研究都只考慮到「戰爭的毀滅性」，而沒有考慮到「戰爭的生產性」（頁2），戰爭在毀滅與非理性的狀態下，還有濃厚的計算與生產成分，所以，「戰爭生產什麼」是作者想要釐清的問題（頁11）。循著傅柯權力與主體（權力生產主體）的思考，作者認為戰爭生產的正是一套與身體軍事化有關的政治治理，戰爭不只是在犧牲身體也在生產身體、生產「人」——「一種符合現代戰爭需要的、具有特定知識、技能和訓練的人」（頁13）。其次，從傅柯「社會戰爭」的命題中，作者提出了主權戰爭（如：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冷戰、韓戰、八二三炮戰等）與社會戰爭兩種戰爭概念的區分與關聯性的問題（頁5, 26）。作者主張：「要掌握戰爭的動力學，大戰略和國際關係不會是全部的答案，一國的內政和主觀的意圖，以及內部戰爭的構築與進度也是動力的來源。我們不能忽略戰爭的雙重性和因之產生的鬥爭與動員對於戰爭本身的影響。」（頁20）正是基於這樣的構想，作者改變了傳統上以非常態為核心的主權戰爭研究，進而強調常態化社會戰爭的重要性。更精確地說，作者所關心的社會戰爭就是指國家對社會內部的統治與治理，而主權戰爭將會作為社會戰爭的原因或條件，或者，我們可以去觀察它對國家治理所產生的影響。

基本上，筆者認為，作者與傅柯同樣都是將「戰爭」的議題導向為「治理」的議題。不過，兩者對戰爭與治理的關係或是社會戰爭的內涵最大的差異就是「國家」角色的問題，這也是作者與傅柯最關鍵的對話面向。作者認為傅柯對於主權戰爭與社會戰爭的區分有助於我們對戰爭多樣性的思考，但是，在分析上，對於社會之戰的片面強調使得傅柯無法去討論兩者之間的共構關係（頁6）。為何會如此呢？作者認為：「在傅柯的討論中，這兩個問題（社會戰爭的種類與範圍以及國家角色的問題）常被分開看待，而且國家的重要性也被相對低估。」（頁27）簡單地說，作者認為傅柯對社會戰爭的討論沒有納入「國家」的角色。作者這樣的主張，主要是由於本書主要研究對象的考慮：

傅柯權力的討論容或精采，卻不盡然適用於一黨專政的國家或社會。……處在動員戡亂時期的台灣，權力的運作和流動卻未必如傅柯研究歐洲史時，指稱地那般缺少中心性。因為，即便是與個體身體有關的規訓權力，它的出現也與國家理性的運算和中心權力的施展有直接關係。層級式的權力和蜘蛛網式的佈署，是這場戰爭能開打40年的原因（指國民黨對台灣進行的社會戰爭）。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去中心化的權力觀點給予保留的原因。（頁165-6）¹

¹ 筆者認為，如果從傅柯的理論觀點來看，作者的論點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首先，傅柯的權力分析主要是針對自由主義社會的反省而非一黨專制社會而發的。如果可以從「法律」和「權利」來標示自由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特色，那麼，傅柯就是要去強調隱藏在兩者背後的權力技術，每一個個體既會是「權利主體」也會是「權力主體」。此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中對於規訓權力最為核心的例證就是，傅柯提出了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圓形監獄來作為其權力分析的模型，此處，傅柯很明確地將其規訓權力的問題

從《戰爭、身體、現代性》全書來看共計七章，除第一章說明重要的概念、研究架構、問題意識以及第七章說明結論之外，作者主要的歷史經驗分析呈現在第二至第六章中。而在這五章中，第二章分析了中國軍事化身體的系譜，及對台灣軍事化身體的影響。第三到第六章則分析了台灣軍事化身體的系譜與治理，第三章以日本統治時期為主。第四章到第六章則以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為主。

在第二章〈武化的身體系譜（I）〉中，作者追溯了中國近代軍事化身體（武化身體）的系譜。此處，值得我們追問的是，為何對台灣軍事化身體的研究要從中國的近代史開始呢？基本上，這涉及到對認識台灣主體性歷史的反省。對作者而言，我們要能夠認識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對台灣的國家統治與軍事治理，就必須要从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與治理開始，並且，黃埔軍隊也是在中國近代的權力格局中誕生的。如果純粹從「荷鄭—清領—日治—國民黨」這樣的史觀出發，就無法揭露出台灣主體性歷史中的中國元素，以及其中所內含的複雜性與曲折性。²所以，如果我們要能理解國民黨在五〇年代試圖「恢復」中等學校以上的軍訓教育，那就必須去探究為何在1928年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還要讓軍訓成為中等以上學校的必修課程（頁50）？而這兩者之間的歷

意識，直接與英國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的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傳統聯繫起來。其次，在《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一書中，傅柯是藉由「種族戰爭」這個概念來觸及到法西斯主義這種極權專政的問題，其中的一個目的就在反省政治理性與政治權力濫用之間的關係，這點也是作者本書的核心目的。最後，儘管「治理性」的概念受到當代廣泛的重視與運用，但是，就傅柯的作品脈絡而言，他對治理性的討論是相對稀少的，這也使得國家權力與治理性的關聯成爲一個爭議的話題。相關論點的討論可以參閱鄭祖邦（2006）。

² 在本書的副標題中，作者所提出的1895年，其中的意義或許不在於我們容易聯想到的日本開始統治台灣，而是袁世凱開始在天津小站按照德國操典練兵（頁36）。

史關聯，更必須回到1862年，在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的支持下，英國、法國、德國教官入駐淮軍陣營，這也是中國軍隊具備現代軍事化身體的開端（不再是刀矛拳腳而是現代火槍的操練）（頁38）。其後的北洋武備學堂（1885年）、新軍（新建陸軍）、黃埔（1924年），正是中國現代軍隊誕生的系譜（頁37-8）。除了在軍營之內，作者更為關心軍事化身體在軍營之外（也就是「社會」）的擴展，特別是1902年軍國民教育開始提倡，作者認為「如果新軍開啓的是一個現代，但卻限於軍營中的身體發展，1902年開始的軍國民教育則是試圖將軍事化變成身體生成的一般性條件。」（頁44）除了軍國民教育，1912年開始出現的童子軍教育是另一種重要且具持續性的軍事化身體的活動。它在1928年為國民黨收編，而在1934年成為初中及同等學校的必修課程（頁58）。基本上，國民黨透過軍國民教育與童軍教育兩種手段，都是為了使國家能對人民的身體與生活進行掌控（頁51）。

在第三章〈武化的身體系譜（Ⅱ）〉中，作者則是從日治時期來追溯台灣軍事化身體的系譜脈絡。相較於中國軍事化身體系譜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葉，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前，去軍事化一直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底線（頁81）。而要到1941年日本進行大東亞戰爭後，才強化了日本對台灣的動員（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以及全民防衛作戰體制的建立，其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及1944年的要塞化更使台灣軍事身體教化成為經常性的舉動（頁79, 85）。基本上，本章的核心在於作者試圖說明，「就身體的軍事養成和社會的軍事化來說，1945年的政權更迭，和相繼產生的去殖民與再殖民（如戰後國民黨去皇民化的動作），並不構成一種歷史斷裂。」（頁109）作者認為，過去的研究一直將五〇年代的軍訓教育的肇始視為是由於救國團的主導推動，這使得日治時期在台灣所施行的軍訓教育在系譜上無從現形（頁109）。正是

日治後期八年的軍事教養，使得國民黨能在台灣實施軍訓而不致引發激烈反對的原因（頁80）。當然，作者也提醒我們，國民黨與日本軍事教養的親近性不僅發生在台灣，1902年的軍國民教育正是在中國生根的日本產物，軍訓體制所遺留的軍國民教育遺風，使得國民黨能無礙地繼承日本遺留在台灣的軍訓產業（頁45, 47, 57-8）。

從第四章〈戰爭與治理〉、第五章〈敵體化的社會〉一直到第六章〈共謀性的治理〉，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詳盡地闡釋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軍事化身體的不同發展面向。比較這幾章的安排，我們可以發現到，第四章的分析重點主要延續了第二章的作法，作者仔細地介紹了在長達42年（1949-1991年）的動員戡亂體制中，國民黨如何進行軍營之內（軍隊的役政）／軍營之外（軍訓、救國團〔1952年成立〕、童軍教育）的身體軍事化的工作。作者認為，從1949年以來，戰爭的爆發與氛圍的建構一直和國民黨政權相結合，而國民黨也一直運用戰爭來合理化自身統治與支配的合理性基礎（頁131）。所以，在這一章中，作者更清楚地說明了戰爭除了生產軍事化的身體，也生產了國家權力的合理性（頁155-6）。在第五章中，作者以「敵體化社會」這個具有創意的概念來描寫國民黨對台灣進行的「社會戰爭」。所以，在這一章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理解作者對社會戰爭這個概念的想法以及具體的歷史分析。基本上，作者認為「警總」（1958年成立）是這場社會戰爭發動的核心，它在台灣發動了一場沒有平時與戰時，沒有前方與後方的戰爭。作者還引用了曾任警備總司令陳守山上將的話說：「今天我們從事的不僅是政治作戰，聽不到砲聲的戰爭，而且是全天候的戰爭。」（頁176）在這場社會戰爭中，敵我的界限和誰是敵人都掌握在警總的手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變成警總要作戰的對象（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在這章中，我們也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作者對國家理性對社會入

侵的批判（頁174, 198-9）。如此，我們也就比較可以清楚地理解到作者爲什麼要對傅柯去中心化、水平流動的權力分析提出不同的見解（頁165-6, 171）。相較於第五章強調國家對社會的權力入侵，作者卻在第六章反過來反省國家權力之所以能夠擴張與氾濫，社會其實也參與或自願接受了相關的軍事化治理，這是一場存在於社會內部的集體共謀。只是在社會中對軍事訓練與管理的再生產，並不以國家的神聖生存爲依歸，它並沒有總體的方向與一致的利益（頁209）。作者進行這樣的分析，就是企圖將研究的視野更進一步延伸到動員戡亂體制結束後的台灣後軍事社會中，並且，希望能回過頭來對本書中一開始所提出的身體軍事化滯留的現象提出具有歷史縱深性的解答。

總體來看，我們可以說，當作者以「身體」作爲理論與歷史分析的視域時，正是試圖經營出一套對「身體強制」的批判，而這點的確突顯了台灣現代性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除了作者在書中所提及的軍事化身體的形成（軍事、軍訓、童軍等）之外，也不禁讓筆者想到，在台灣生活的人曾因戰爭的結構性條件而受到強烈的身體強制，例如：1949年隨國民黨撤遷來台的外省人、國共內戰期間被國民黨徵召前往中國作戰被俘不能返台的台灣人，或者反過來在古寧頭戰爭期間被俘而不能返回中國的共產黨人。在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重糾結之下，這些人都歷經了近半世紀的身體強制（不能返鄉），戰爭的對峙凍結了原本屬於個人的生命和情感的交流。或許從這樣的角度，我們更能去體會作者對「身體強制」的批判，以及不時在書中所流露出的價值關懷、一種對「個體自由」與「人」的關懷，正如作者所言：

研究戰爭就是爲了讓操弄戰爭的空間不再存在……作爲一個研究歷史的社會學者，「非戰」卻是我傾向選擇的立場。畢竟，

社會學要求於自身的，不只是經驗的分析與實證資料的蒐集，還有一份對人與生命的關懷。這個存有層次的關注，會影響到知識層次上，社會學如何看待戰爭的問題，與社會學對歷史評價的立場。……畢竟，我必須先是「人」，然後才能成為社會學者，然後才能寫出這些文章，這個方向無法逆轉。（頁236）

所以，對作者而言，研究戰爭，研究軍事化的身體治理，就是希望每個人的身體都能走出國家理性與軍事治理的陰影，我們不必先成為「國民」，然後才成為「人」（頁163），這樣才能追尋真正的身體自由。

最後，從當前國外學術研究潮流來看，戰爭議題已逐漸受到不同層面的關注。在2001年911事件之後，英美兩大社會學刊物*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以及*Sociological Theory*分別於2002年和2004年以911、恐怖主義和戰爭為主題刊載了許多社會學者的討論文章。美國社會學者Douglas Kellner在〈911、社會理論與民主政治〉（September 11, Social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一文中更是質問：「重大的歷史事件——像是911的恐怖攻擊以及接續的恐怖戰爭——測試著社會理論，並且提出了一項挑戰，亦即，對於該事件及其結果賦予具說服力的說明。」（Kellner 2002: 147）此外，從台灣自身的脈絡來看，無論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或是當前的日常政治中，戰爭一直是攸關台灣發展命運的關鍵議題。例如，從九〇年代以來的民主化過程中，由於激烈的政黨衝突與年年的選舉競爭，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有一項與「戰爭」議題有關的選舉訴求（特別是全國性的大選）。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不斷地告誡台灣人民「選民進黨就是台獨就會引發戰爭」。同樣的邏輯也發揮在執

政之後的民進黨身上，政府高層不時提醒著我們「中共有六百多枚飛彈對準台灣」，選民進黨就是愛台灣保衛台灣的行爲。雙方不斷地透過戰爭的訴求來動員人民的選票。在這些選舉的激情背後，我們如何能從學術的角度冷靜地慎思觀察自身的命運，相信是值得持續努力的課題。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本書的出版相信可爲學界未來相關的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而作爲本書的一位讀者，筆者只能儘量將所讀到的心得整理出來與其他對本書有興趣的潛在讀者一起分享。面對這超過十七餘萬字的歷史社會學著作，這篇書評將是有限的，在書中仍有許多尙未言說的精采之處只能等待大家親身閱讀與發掘。

作者簡介

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政治社會學、社會學理論。目前主要研究重點爲戰爭與現代社會理論、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發展之研究。

參考書目

鄭祖邦，2006，〈傅柯論戰爭：從「社會內戰」到「生命權力」〉。

《社會理論學報》9(1): 1-47。

Kellner, Douglas, 2002, "September 11, Social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4): 147-159.